

兒童性侵害案件中的專家證人與兒童作證

陳慧女・林明傑

壹、前言

去年發生在台北縣的顏小妹妹的性侵害案件不起訴乙事，經由媒體的報導而引起社會大眾的紛紛議論，以及社工界的關注與回應。若以該事件作為教材的話，其實有很多可以討論的議題，如果是從法律層面來看，包括：當舉報孩子遭受性侵害，是否就等於實際遭受性侵害？不起訴是否就等於無罪？而起訴了是否就等於有罪？無罪是否就等於性侵害事件未曾發生？有罪是否就等於發生性侵害？以上這幾個問題看起來很簡單，但是在實務上卻有很多的爭議與討論。兒童在性侵害案件中的證詞是否可以被採信？作為助人的專業者在這類案件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專家證人對於性侵害案件可以提供怎樣的意見？而社會工作在這類的案件中應如何展現其專業的角色與功能？這些都是需要加以探討的議題。

因此，本文擬以美國在兒童性侵害案件中（以下所稱兒童性侵害是指未滿 18 歲的兒童及少年所遭受的性侵害）之專家證人與兒童當事人作證的文獻與經驗作為參考，首先由探討在法庭上如何呈現科學證據的一些概念、專家證人的角色與作證、

並進一步討論兒童作證的爭議與可信度，最後提出幾項對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啓示與建議。

貳、科學證據的呈現

一般而言，如何在法庭上呈現具有科學性的證據以為法官判決的參考，是舉證過程中相當重要的部分。Horowitz, Willging, & Bordens(1998)指出 DNA(Deoxyribonucleic Acid, 去氧核糖核酸)檢測、測謊器(The polygraph)、統計上的機率、臨床學家等四個主題之研究是相當值得探討的，這些都是在提供科學證據上的可行方向。像是在性侵害案件中，以 DNA 檢測殘留於受害當事人身上的任何體液與毛髮的證據；而在筆者協助性侵害受害當事人的經驗中，也有因偵辦的檢察官認為證據不夠充分，擔心是兩造之間的誣告，為求慎重起見而考慮當事人接受測謊；以及如精神科醫師、心理師、或是社工師之專業的評估意見或報告等，也都有可能是提供舉證的來源之一。

而在美國對於法庭中之科學證據呈現的歷史中，最重要的判例為 Frye v. United States (1923) 及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1993)，以下分別說

明這二個判例對於爾後科學證據的採認準則的建立，同時它也對於性侵害案件中的專家作證提供一個依循的指標。

一、佛瑞判例—Frye v. United States (1923)

佛瑞案是第一個決定科學證據之許容性應與其他的證據不同的案例。James Alphonzo Frye 被控二級謀殺罪，專家對 Frye 所做的測謊結果顯示其並未說謊，辯方律師認為專家對該案件相關領域具有專門之訓練與經驗，而未受訓練或無經驗之一般人是不太可能做出正確之判斷，因此當某類非普通知識或經驗可判斷之案件時，專家之意見應具證據能力。因此辯方律師要求在該領域之專家來作為專家證人，以檢驗其測謊結果，但是遭到駁回。最高法院認為測謊在相關的科學社群中，並未達到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因而不允許測謊證據之容許性。當時，測謊結果尚未為科學界所普遍認同，因此該案之測謊結果不具證據能力。

因此，佛瑞判決提出 Frye Test，又被稱為「普遍接受」檢驗("general acceptance" test)，其包括兩個判斷步驟：首先，該專家必須被認定為具備與該案件所涉及相關的專業領域；其次，該專家必須為同專業領域的其他專家所普遍接受者 (Maston, 1999)，依此建立了專家意見之作為證據的準則。

二、道柏判例—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1993)

(一)道柏判例在法庭與判決上的影響

道柏案為一民事侵權行為的訴訟。原告 Jason Daubert 與 Eric Schuler 二人控告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藥品公司，因其母親在懷孕期間服用該藥廠所製造的 Bendectin 藥物以治療嘔吐，以致其出生時即缺少手臂。此案例之受爭議的地方在於原告所提之證據是引用流行病學之次級資料而來，也就是其所引用的證據是先前論文期刊中所得之結果，再加以分析以用來支持原告的主張。審判法院發現原告所提供的證據並不充分，第一，法院認為已發行的流行病學的研究論文中，並未包含有證明 Bendectin 藥物與新生兒先天缺陷之統計學上的顯著關係；第二，雖然原告意圖將既有之流行病學資料顯示其與藥物致缺陷之間具統計之顯著，但是其並未充分滿足其所提出之流行病學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之證據的討論責任。因此，該案法院之陪審團認為「Bendectin 或許導致被告之傷害」，但因該證據並不符合其所屬專業社群中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因而作出被告無罪之判決。

道柏判例作出科學方法學的使用是否有效、研究是否可應用於審判上的議題、其他的研究是否支持該專家之研究的判斷 (Penrod, Fulero, & Cutler, 1995)，希望能將不好的科學加以剔除，並留存下好的科學 (Tomkins, 1995)。

Frye Test 因強調「普遍接受」不適用於日新月異的專業技術發展，甚至會妨礙採用新近的技术或觀點於鑑定工作上。因此，在道柏判例之後，1993 年 6 月美國最高法院以聯邦證據法則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FRE) 取代 Frye Test，法院不再以該學科專家之一致性意見為依據 (Tomkins, 1995)，最高法院定訂出專家證據被考量的五項指導原則，由各該法院決

定其是否接受科學證據，而這五個原則中並沒有一項是專斷性的：

- 1.科學技術是能被測試驗的。
- 2.該科學或技術曾為專業同儕所審查而發表或出版。
- 3.其可信度有已知或潛在的誤差率。
- 4.控制該項技術的操作方式有其現存的標準程序。
- 5.在該科學社群中，該技術有其被接受之程度。

(二)道柏判例在專家作證上之影響

道柏判例的確放寬了科學證據之可用標準，但是對法官的改變並不大。在該判例之後，法官對專家證人與目擊證人仍存有部分保留態度，其考慮的因素包括有：(1)有些法官認為目擊證人之效度研究仍未成熟。(2)法院深信兩造之交互對質會很有用。(3)法官也可能認為只要告誡目擊證人好好想一想即可。(4)法院認為專家證人之解釋可能會混淆陪審員 (Penrod, et. al., 1995)。不過也有人認為在道柏判例後，應會增加法院對專家證人之使用率 (Horowitz, et. al., 1998)。

參、專家證人

從上述判例之中，可見專家證人逐漸受到重視，尤其在一些特殊的議題中，專家證人的專業知識或經驗會是提供相關案件的證據來源之一。尤其我國在 92 年 9 月 1 日開始實施刑事訴訟法新制，包括全面合議審判及交互詰問之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新制。檢察官與辯方律師對於性侵害或家暴案件在法庭上的攻防辯論將會愈來愈普遍，檢方與辯方將有同等的地位為其當事人辯護。因此，專家證人也有可能愈為

檢辯雙方所採用。

一、專家證人

(一)誰是專家？誰是專家證人？

專家證人是具有專門的知識、技術、經驗、受過訓練或教育的人，他們能向法官或陪審員解釋一些其可能不瞭解的、有關辯護之重要事項 (Stern, 1997)。在專業領域中的專家與在法庭中的專家是不同的，在法庭中的專家並不是來代替法官或陪審團去審判案件，而是以其專門的知識與經驗協助法官或陪審團瞭解犯罪的內容 (Andrews, 1991；Stern, 1997)。

專家有可能是該領域之學有專精的學者、具豐富經驗的臨床工作者、或者是該領域具相當經驗的人員。Stern (1997) 列出專家的可能資歷包括：所受的教育、學位論文、實習訓練、參加特定訓練、曾參加相關研討會、協(學)會會員、曾獲相關學術獎項、持有證照、從事相關研究、發表相關論文、出版相關書籍、擔任相關領域之諮詢顧問.....等。而心理衛生的專業人員在法庭上對兒童性侵害案件的作證，主要在以其經驗與訓練提供：(1)有關兒童性侵害的大概內涵；以及(2)遭受性侵害兒童會有的一般特質，而非其特定行為等二種性質之作證 (Mason, 1998)。

Mason (1991) 在其研究中，統計自 1980 至 1990 年間美國之上訴法院運用專業人員擔任專家證人的情形，發現法院幾乎以臨床人員擔任專家證人 (總計 160 人中，專業人員佔 146 人，其他佔 14 人) 居多，其中社會工作師佔 34%，臨床心理學家佔 31%，諮商師佔 12%，精神科醫師佔 8%，醫師佔 8%，其他人員佔 9%。從這

個資料可知心理衛生工作人員在性侵害案件中的專家作證佔有相當之重要性。在台灣則需進一步瞭解在交互詰問制度實施之後的專家證人運用情形，以為專業人員之參考。

(二)專家的角色

專家證人在法庭上扮演著教育者、解述者、說明者、倡導者的角色 (Horowitz, et. al., 1998; Stern, 1997)，而一個有效能的專家證人也必須是靈活的、有見聞的、細心的、能清楚表達的、有常識的、有警覺性的 (Stern, 1997)。綜合而之，不管是在檢方或辯方所邀請來的專家證人，最好能具有上述的角色與特質。Stern (1997) 也認為不管是採用 Fyre Test、Daubert Test、或其他的標準，專家必須要能展現其專業理論的可信度，而所有類型的專家作證都需立基於科學或其專業上的原則。

(三)專家的功能

Stern (1997) 認為醫療或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在法庭上擔任專家證人通常有三個功能，分別為：

1.背景證人 (Background witness)：在提供與該案件相關的基本科學原則及（或）現象之一般科學背景資訊，專家並不需為該特定案件表達意見。例如：在兒童性侵害案件中，對於兒童為何不敢揭露遭侵害之事實，專家可能是引用科學研究來描述兒童之所以遲遲不揭露的比例，以及運用臨床案例之報告來說明兒童不敢揭露的原因。

2.個案證人 (Case witness)：即回顧與該案件相關的資訊，包括：臨床個案紀錄、警方之筆錄、證人之陳述、會談之錄影、證詞、以及其他既存的案件資料，這些資

料可充分提供專家去發展一個確實與合理的意見。個案證人除了提供一般的資訊之外，也提供與該案件相關的直接意見。所以在性侵害案件中，專家證人可評估上述資料之可信度、去發展其對兒童為何不揭露之原因的意見。

3.評估證人 (Evaluating witness)：運用背景資訊之知識、回顧個案資料、對該案件當事人做獨立的評估。評估證人可就其專業知識與經驗，以及其評估之結果發展其對案件之意見。因此，在性侵害案件中，專家可就背景資訊、既存個案資料、專業上之評估等三方面來發展並提供其對兒童之所不敢揭露遭受侵害原因之意見。

從以上三項功能來看，可見其有不同的目的，要選擇哪一種功能，應是由專家與律師在初期約定過程中協商好的。在選擇上是根據律師所發展的目標或意見、該案件可使用之資料的本質、評估當事人之困難度等三個議題來作考慮。

二、在性侵害案件中的專家作證

在性侵害案件中，未成年的兒童及少年佔大多數，以各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受理的舉報案件而言，幾乎佔 60% 以上。在筆者協助遭受性侵害的兒童、少年的諮商過程中，也經常會面臨到正由檢察官進行偵辦蒐證的性侵害案件，因為檢察官認為證據不足而不予以起訴，或者是因為從當事人的身體上找不出傷害的證據而困擾，以致淪於兩造各說各話的境地，也因此檢察官在起訴與否之間陷於兩難之境。因此，在性侵害案件中的專家作證，很重要的是要讓檢察官、法官或陪審團瞭解性侵害的基本概念、兒童性侵害的症狀等，以

協助其瞭解這類創傷的學理與臨床症候。

(一)性侵害的界定

由於性侵害的本質是多面向的，但是目前尚缺乏直接評估兒童性侵害的工具與技術，因此實務工作者需熟悉兒童性侵害的界定，包括：(1)性侵害的定義含暴露狂、親吻、愛撫、性交、口交、肛交、以手指或以異物插入性器官等；(2)侵害者有可能是家庭成員、熟識的成人、與陌生人；(3)侵害的期間有可能是持續數月、數年，頻率可能是經常或每週不等（Fisher, & Whiting, 1998）。

在台灣則是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對於性侵害的定義為法律上定義；但是學理與臨床上的定義則是專業人員需要瞭解的。

(二)運用理論模式來解釋兒童性侵害的

確實度

目前經臨床經驗發展出被運用來解釋兒童性侵害的創傷，大抵有以下的解釋觀點：

1.兒童性侵害症候群（Child Sexual Abuse Syndrome, CSAS）與兒童性侵害順應症候群（Child Sexual Abuse Accommodation Syndrome, CSAAS）

Sgroi（1982）與 Summit（1983）提供一種實務上觀點來看兒童性侵害此種令人悲痛且在治療上是極為複雜的挑戰工作。Sgroi（1982）所提出之 CSAS 將兒童性侵害概念化為是成人運用其權威與權力去壓迫兒童，使其在性方面順從，致其在情緒上、發育上、認知發展上受損；此症候群包含二十項有關兒童性侵害行為的指標（引自 Fisher, & Whiting, 1998：163）。

而 Summit（1983）所提出之 CSAAS

包含五個類別：(1)性侵害是一種秘密；(2)無助感；(3)受誘與順應；(4)對於揭露性侵害事件感到遲疑、衝突、無法置信；(5)退縮（Summit, 1983）。

2.創傷後壓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第四版的 PTSD 診斷標準，亦是性侵害確實度評估之一。PTSD 的診斷包括：(1)曾經直接或間接地經歷一種創傷事件；(2)一再地經驗此創傷事件；(3)持續逃避與此創傷有關的刺激，並有著一般反應性的麻木；(4)持續有驚醒度增加的症狀；(5)症狀期間超過一個月；(6)造成臨床上的重大壓力或痛苦（孔繁鐘、孔繁錦編譯，1998）。

而 McLeer, Deblinger, & Atkins, Foa, & Ralphe（1988）及 Walker（1990）整理兒童對於性侵害的反應在 PTSD 症狀上有：(1)透過重複的遊戲、噩夢或重演（如：不適當的性遊戲）再次經歷壓力事件；(2)逃避任何與該創傷有關的人事物，包括不易專注、不願意談及該侵害事件；(3)驚醒度增加，包括不易入睡、憤怒、攻擊、易分心等（引自 Fisher, & Whiting, 1998：165）。

3.創傷動力模式（The Traumagenic Dynamics Model）

Finkelhor, & Browne（1985）的創傷動力模式，協助臨床人員與研究者概念化出性侵害對於兒童在認知與情緒能力的影響，包括創傷的性化經驗、被背叛的感覺、無助感的自我、被污名化的個體等四個部分。而這也是目前在解釋性侵害創傷之最普遍被採用的模式。

三、法庭評估報告及上法庭作證

(一)撰寫法庭評估報告

Melton, Petrila, Poythress, & Slobogin (1997) 認為法庭評估報告有以下三個重要功能：

1.它是一個經過評估之後所做的專業紀錄。而評估的本質及當事人專業接觸的內容，是透過接觸的摘要、調查的方法，以及所轉介之專業人員所提供之資料而呈現，而在評估中之發現與限制部分也需撰寫於報告中。

2.報告能促進實務工作者將當事人的相關資料加以組織，也能協助工作者對於證詞作檢核及預做準備。

3.可以提供非正式協商的基礎。一份寫得完整而清晰的報告，可以滿足兩造對報告之發現及結論產生共識，也能夠當作非正式和解，如認罪協商或法庭外和解的基礎。

而在撰寫報告方面有以下四個原則：

1.需根據事實來作推論。包括：轉介來源、訪視或觀察之概要、註明相關的資料來源、有關當事者個人的背景資料、臨床上的發現、將前述資料整合並以邏輯或理論的核心主題指出其臨床上與法律議題相關之處。

2.需根據所轉介的問題陳述內容。

3.避免所提供的內容超出本身所具備的專業知識與技術。

4.避免使用專業術語。也就是所寫的報告，必須讓非專業者的一般人都能看得懂。

而根據筆者的經驗，平常在接案、處遇或提供諮商的過程中，專業人員所撰寫的個案會談、諮商紀錄，即需就當事人及

其相關人員之陳述，以及專業人員的觀察具體撰寫，勿有個人主觀的評斷或不具學理的猜測。因為這些紀錄一方面會是在撰寫給法庭之評估報告時的參考依據，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會被檢察官或辯方律師調閱，若傳票一到，則需提供。因此，如何撰寫具體詳實的個案紀錄、具專業性的評估報告，是社會工作的專業訓練中重要的一部分，因為紀錄是真實地反映出對當事人處遇過程的脈絡、工作人員呈現專業的一種方式、更是對當事人的一種責信與基本的倫理。

而當事人是有權利可以閱讀其個案紀錄及給法庭的評估報告。筆者也建議，在呈給法庭評估報告之前需事先給當事人閱讀，一方面讓其瞭解諮商師或社工師對其所做的評估為何；另一方面當事人也可以有機會表達其對諮商師之報告的意見，而且有時當事人也可就一些與事實有誤之處加以指正；更重要的是，這是專業倫理中尊重當事人的作為。

(二)在法庭作證之原則

Stern (1997) 認為在交互詰問過程中，專家證人應謹守以下七個原則：

1.要記得對方的律師可能跟你一樣緊張。

2.身為一位專家證人，你有相當大的權力可以決定交互詰問如何進行。

3.要非常專注地聆聽問題。

4.要知道交互詰問並非是專業上的辯論或尋求真實，事實上它是一種對辯過程中攻擊的一部分。

5.要時常想著你所被問的問題，就如同這些問題是在你所生活的真實世界中被問起般。

6.要保持專業。

7.要保持誠實。

四、擔任專家證人之倫理上的議題

擔任專家證人，不可避免的仍會遇到相關的倫理議題。包括：保密、告知後同意、所提供的意見不可超出本身之專業經驗，需立基於科學的事實、面對利益上的衝突時應加以拒絕及避免、避免違背倫理上的問題（例如：需遵守專業的倫理守則、諮詢相關專業人員或協會的意見、發展非正式的同儕諮詢機制等都可以是盡量避免倫理問題的預防方式）等都需謹記於心；專家證人的作為應符合倫理、專業、科學上的標準（Stern, 1997）。

在筆者的經驗中，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在提供法庭有關當事人的評估報告之前、上法庭作證之前都務必事先告知當事人，甚至是檢察官或是辯方律師在開庭之前的約談，都需告知當事人使其瞭解並取得其同意，因為上法庭、約談等情形都可能需要將當事人的資料提供予其知悉，這是專業倫理中需加以注意的部分。

肆、兒童證人

由於性侵害案件的揭露，兒童逐漸成為在法庭中擔任目擊證人的重要來源。但是兒童的作證能力，及其證詞的可信度，一直是爭議的焦點。以下從美國在 16 世紀時所發生的「賽倫女巫審判事件」談起，以探討兒童在知覺、記憶、被暗示性、運用偵訊輔助娃娃等之研究結果與其討論議題。

一、兒童作為目擊證人的考量

(一)美國麻州的「賽倫女巫審判事件」

在 1692 年 6 月 10 日至 9 月 19 日之間，美國的麻薩諸塞州的賽倫村（Salem Village）有 20 名居民因為使用巫術的罪名而被起訴，最後被處死。這些人被處死的證據就是一群年紀在 5 至 16 歲之間的孩童所講的證詞，他們聲稱看到女巫的作為，並在看到女巫之後即昏厥、癱瘓，或吐出鐵釘來。然而，後人從賽倫審判的紀錄中發現，紀錄中顯示出這些孩子是受到暗示性說辭的誘導－父母、牧師、法官勸服孩子其確實看到行使巫術的證據。然而在 1796 年有位當時指控女巫的女孩－安・普特南在對牧師的告解中提及其對當年所作之證詞的後悔及被引導的情形（引自林淑貞譯，2001：198～200）。也因此，一直到 1895 年，兒童仍被視為無作證能力。在 1895 年，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解釋：認為兒童不能被視為沒有自主能力的人，兒童的作證能力應視個別案例而定（Haugaard, Reppucci, Laird, & Nauful, 1991）。

賽倫女巫審判事件是兒童被暗示性的誘導做出的證詞，在多年之後還原其真象，但是，兒童是否可以作為證人呢？美國著名的鑽研認知與記憶的心理學家 Elizabeth Loftus，在其多年擔任辯方證人的經驗中，以其對記憶的研究，發現到有不少被誤判的案件，（林淑貞譯，2001）因此，記憶是否可靠？兒童的記憶是否足以被採信？這些都是兒童作為證人的爭議。

(二)兒童是否能做為證人的爭議

關於兒童記憶與兒童作證之可信度的心理學研究有二個派別，其中一派認為兒童很容易在暗示性問題的誘導下說出另一

個不同版本，或者是乾脆採取詢問者的版本；另一派則認為兒童不會故意謊報創痛性的事件，孩子不會故意撒謊的。不過 Loftus 根據其多年的研究認為：並非是「撒謊」，而是「故意」，記憶的改變通常是不自覺的，記憶的扭曲也是漸進的過程，不是思考之後的結果，孩童可能受到暗示而有扭曲的記憶，成人的記憶也可能充滿矛盾（林淑貞譯，2001）。那麼兒童的證詞是否可以採信呢？

二、兒童的知覺過程與記憶

(一)兒童對事件的記憶及對兒童的暗示性

已有相當多的針對兒童的知覺與記憶的研究，不同年齡的兒童有其不同的情形，大抵而言，8歲之前的孩童之選擇性、知覺力較不完整，愈年幼的孩童（七歲以下）之注意力較不易集中、愈年幼兒童的記憶之正確性較低（Horowitz, et. al., 1998）。

在受暗示性方面，由於兒童的記憶比成人更為受限，也較不成熟、易受暗示（Horowitz, et. al., 1998）。許多的兒童暗示性研究也協助了臨床工作者對兒童受暗示性有進一步的瞭解，並能在實務工作中予以注意並加以克服。

像是 Horowitz, et. al. (1998) 整理了幾位研究者對於兒童受暗示性的研究發現有幾個因素會影響兒童受暗示，包括：(1)當兒童本身的記憶模糊、問兒童問題的人地位愈高時（Goodman & Helgeson, 1988）、或問話者是成人而不是小孩時（Ceci, Ross & Toglis, 1987），或對事件經驗愈有壓力時，兒童會更容易受暗示；(2)兒童也並非對不同事件都有相同的受暗示程度，像

是對於人、物有較高之受暗示性，但是對事件之受暗示性低（Dent & Stephenson, 1979）；(3)若能事先向兒童預告其被問的問題有可能是模糊的，那麼他們可以較有信心地給予回答，則可減低受暗示性（Warren, Hulse-Trotter, & Tubas, 1991）。

(二)運用輔助道具以增進兒童記憶力的

爭議與討論

在性侵害案件中，對於兒童偵訊之輔助道具包括二種：房間小模型（娃娃屋）與偵訊輔助娃娃（sexual anatomically correct doll，簡稱 SAC doll，有性器官的娃娃）的應用（Horowitz, et. al., 1998）。在美國有 95 % 的兒保機構均已使用 SAC doll（Everson & Boat, 1990）。

然而，在使用輔助娃娃時，若未有標準化的程序，則容易遭受對兒童暗示性的批評。像是 Bruck 等人（1995）的研究中發現對於 3 歲兒童使用偵訊輔助娃娃會增加錯誤的報告，其認為兒童可能會因暗示性的問題而改變記憶，若使用偵訊輔助娃娃則會增加其使用記憶之效應（引自 Horowitz, et. al., 1998：211）。

O'Callaghan & D'Arcy (1989) 研究運用道具對兒童記憶的影響，讓兒童看 3 分鐘的錄影帶之後進行訪談，第一組做自由回憶、第二組自由回憶加上使用娃娃道具、第三組被詢問 24 個非偏誤性的短答問題、第四組被問短答題加上使用娃娃道具，結果發現：(1)在訊息上：短答問題比自由回憶可得到更多訊息、若使用道具會比沒使用道具得到更多訊息；(2)在準確度上：若以短答問題詢問，則有無使用道具並無差異、若自由回憶加上使用道具，則會減低準確度。

在 Goodman & Aman (1990) 的研究中發現並無證據顯示使用娃娃會對記憶產生反效果。因此，若問短答問題再加上使用娃娃，不會減低記憶之正確度。然 Bruck 等人 (1995) 認為年齡很重要，年齡愈小愈容易受暗示，尤其是三歲以下的孩童，其建議最好不要使用 SAC 娃娃（引自 Horowitz, et. al., 1998：219）。

Skinner & Berry (1993) 二位學者即指出使用偵訊輔助娃娃有以下之問題是需要加以質疑及注意的：

1. 在使用上缺乏標準化的使用（缺乏信度）程序，不同的人使用娃娃可能會缺乏信度。
2. 使用娃娃對兒童做評估時，缺乏標準化程序。
3. 對於兒童的行為反應缺乏標準化的計分。
4. 對於能一致性地使用 SAC 之方法上欠缺訓練。
5. 非遭受侵害者與被侵害者之行爲的差異應有標準化的資料可供參考。

許多對於偵訊輔助娃娃的研究都有其不同的結果與看法（Horowitz, et. al., 1998）；而且也沒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出在評估的過程中不應使用偵訊輔助娃娃，透過對專業人員在訊問技巧之訓練、發展出標準化的程序應能增進使用偵訊輔助娃娃的效度（Lie, & Inman, 1991）。因此，最主要的還是需要發展出標準化的操作程序，在美國也已逐步發展出標準化以娃娃作為對兒童偵訊的輔助工具；而在台灣，內政部已購買輔助娃娃給各縣市政府家暴與性防中心使用，但多只做輔助用（主要是針對年幼兒童與弱智者）。

三、小結

在大部分的司法審判中，在兒童被允許去作證之前，兒童作證的能力必須被建構好（Horowitz, et. al., 1998）。而從以上的探討，筆者認為或許經由標準化的詢問、標準化操作偵訊輔助娃娃的程序，那麼兒童是可以做出可信的證詞。而發展標準化的會談及詢問步驟、具科學的、可評量的操作流程，那麼對於兒童作為證人的信效度上會有更多的助益。

伍、對社會工作專業的啟示

隨著社會的變遷與進步，近十年來諸多福利法案的通過與實施，在在都給予社會工作專業相當的挑戰。社會工作如何在這過程中隨著進步、增進專業才能，以給予當事人同步的品質服務，這依然是作為一位專業工作者不斷要思考精進的議題。就上述兒童性侵害議題之討論，提出幾個對社會工作專業的啟示。

一、社會工作的專業訓練是否足以勝任？

（一）社會工作教育與訓練之檢視

對於性侵害、家庭暴力、兒童虐待這類保護的案件而言，社會工作的專業訓練其實需要更講求品質與效率。除了傳統社工教育中所教授的個案工作、個案管理、團體工作、社區工作、社會行政等等，教導社工系畢業的學生要成為服務的提供者、支持者、行政者、溝通協調者、資源媒介者、倡導者……之外，在這類保護性的案例中，其實社會工作人員要做的可能不止如此。

目前社會工作教育以大學為基礎學

歷，社工師法中的證照考試資格，也是以大學社工相關科系，或是非相關科系但修過社工相關 20 個學分即可報考，專業證照考試的資格似乎過於寬鬆。在美國對於精神科、心理師、社工師是以至少碩士學位以上的資格，臨床心理學家則必須是博士學位。而台灣目前之醫師的訓練是醫學系七年（含見習及一年實習）或學士後醫學系數年的學習、心理師的訓練是心理或諮商輔導研究所七年（含學士四年、碩士二年、碩士後全年駐地實習 1 年，總計至少 7 年）的學習。然而，同是從事專業工作的社工師，卻只要修畢 20 個相關學分即具資格，如此的條件顯然過於寬鬆，也會令一般大眾質疑社工的專業性。尤其是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是否得以勝任這些具危機、緊急、且複雜的個案處遇呢？對於社工師的培育顯然應該有嚴謹的學經歷訓練。

(二)提供司法的專業評估報告及個案紀錄的撰寫能力

如前述之評估報告及個案紀錄之撰寫的重要性，目前對於社工科系學生的教育，在這方面是否有紮實、嚴謹的訓練？還是在學生畢業從事社會工作之後，才開始從錯誤中學習？筆者之實務經驗中，閱讀過許多不同案型及格式的紀錄，也發現專業品質參差不齊，這是要正視的問題。當我們所處理的許多個案均涉及法律、倫理的議題時，文書的紀錄通常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參考資料。因此，如何撰寫具專業性的個案紀錄及評估報告，實為社工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這不只是學理上的說明及教授而已，更需要的是實務的操作，以及對專業紀錄重視的精神。

(三)與相關專業的溝通協調與合作能力，以及專業自信的呈現

社會工作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學生是否具有專業自信、自我自信及專業能力得以與其他的醫療、司法、警政等專業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呢？能站在當事人的權益上與其他專業溝通、教育或倡導有關社會福利的理念，讓專業之間可以有更良性的互動與溝通，讓其他專業能肯定社會工作的能力，這是培訓社工專業人力過程中需要思考的問題。

筆者多年的實務經驗中，深感培養社會工作的專業自信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若無自信，那麼是難以與其他更強勢的醫療或司法專業進行平等與互相尊重的對話。

二、加強法律社會工作的教育

許多的保護案件都需要社會工作的處遇，這些案件多與法律有關，社工教育中除了社會政策與立法之外，實應加強相關民法、刑法、以及與法院、司法、警政相關的協調與溝通知識，甚至是將相關的案例整理作為教材。像是在美國已有社會工作學家將社會工作、社會福利有關之案例整理作為實務工作之參考（Pollack, 2003），包括對於性侵害、身體虐待、疏忽遺棄、收出養、寄養家庭、監護權、婚姻暴力、老人保護等案例與判例之整理，以作為社工教育與實務訓練之教材。

三、建立國內有關性侵害案件之判例

美國在各類案件上已累積相關的判例，以作為各州法院之參考。然而，國內在這方面仍未有相關資料作為參考，在台灣各法院對於性侵害案件的審判仍多以法

官的心證為主。若能從判例中建立起參考的準則，而非只是法官的心證，那麼對於當事人的權益保障應能更為妥切，而判例的建立與整理實為司法界與社福界可以發展的方向。

陸、結論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自 1997 年立法實施之後，於 2001 年 1 月 1 日改為非告訴乃論，在實施之後至今已近六年的時間，而非告訴乃論也已實施二年半。被起訴的案件佔所有舉發案件之比率有多少？而被定罪的案件又有多少？這是身為專業的助人工作需要加以關注，且必須審視自己的專業在這類隱私性的傷害事件中，對於很有可能是受害人、且亟待協助的當事人而言，我們可以提供如何的協助？忠於自己的專業，提供當事人最適切的服務、為當事人

的福祉與權益著想，然而，要怎麼做呢？尤其在這類保護的案例中，通常必須與司法有相當的互動，如何將社工專業與司法做良性的溝通，並能提供具有科學性的專業意見給予參考，就成了相當重要的課題。

專業勢必要立基於科學，當我們在為當事人爭取權益、作最佳利益考量時，除了助人的熱誠、同理心、專業知識與技術之外；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實務工作者或是學術研究者，都要在具有科學哲學的基礎下去實踐社會工作專業。否則，社會工作也只不過是比志工多一些知識與技巧的助人者而已。

（本文作者：陳慧女為高雄師範大學諮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暨高雄市兒童青少年與家庭諮商中心諮商師；林明傑現任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引用案例：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113 S. Ct. 2786 (1993).

Frye v. United States, 293 Fed. 1013 (D.C.Cir.1923).

參考文獻：

林淑貞譯（2001）辯方證人。Loftus, E. & Ketcham, K.原著(1991), Witness for the defense: the accused, the eyewitness, and the expert who puts memory on trial.台北：商周出版社。

孔繁鐘、孔繁錦編譯（1998）DSM IV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Diagnosis and statistics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s.台北：合記圖書出版社。Andrews, A. B. (1991). Social work expert testimony regarding mitigation in capital sentencing proceedings. Social Work, 36(5), 440-445.

Bruck, M., Ceci, S. J., Francouer, E. & Renick, A. (1995). Anatomically detailed dolls do not facilitate preschooler's reports of a pediatric examination involving genital touching. Journal

-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2, 95-131.
- Ceci, S. J., Ross, D. F., & Toglia, M. P. (1987). Suggestibility of children's memory: psycholeg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16, 38-49.
- Dent, H. R., & Stephenson, G. M. (1979).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techniques of questioning child eyewitness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8, 41-51.
- Finkelhor, D. & Browne, A. (1985). The traumatic impa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conceptua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5, 530-541.
- Fisher, C. B. & Whiting, K. A. (1998). How valid are child sexual abuse validations? In Ceci, S. J. & Hembrooke, H. (ed.), *Expert witness in child abuse cases* (pp159-18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Goodman, G. S., & Aman, C. (1990). Children's use of anatomically detailed dolls to Recount an event. *Child Development*, 61, 1859-1871.
- Goodman, G. S., & Halgeson, V. (1988). Children as witnesses: what do they remember? In L. E. A. (ed), *Handbook on sexual abuse of children* (pp.109-136). New York: Springer.
- Haugaard, J. J., Reppucci, N. D., Laird, J., & Nauful, T. (1991). Children's definitions of the truth and their competency as witness in legal proceeding.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5, 253-272.
- Horowitz, I A., Willging, T.E., & Bordens, K. S. (1998). *The psychology of law: Integ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2nd ed). NY: Longman.
- Lie, Gwat-Yong, & Inman, A. (1991). The use of anatomical dolls as assessment and evidentiary tools. *Social Work*, 36(5), 396-399.
- Matson, J. V. (1999). *Effective Expert Witnessing* (3rd ed). Florida: CRC.
- Mason, M. A. (1998). Expert testimony regar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xual abused children: a controversy on both sides of the bench. In Ceci, S. J. & Hembrooke, H.(ed.), *Expert witness in child abuse cases*(pp217-23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Mason, M. A. (1991) A judicial dilemma: expert witness testimony in child sex abuse case.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Law*, 185-219.
- McLeer, S., Deblinger, E. & Atkins, M., Foa, E. & Ralphe, D. (1988).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27, 650-654.
- Hembrooke, H. (1998). *Expert witness in child abuse cas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Melton, G. B., Petrila, J., Poythress, N. G. & Slobogin, C. (1997).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s for*

- the courts -A handbook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lawyers (2nd ed.). NY: The Guilford Press.
- O'Callaghan, G., & D'Arcy, H. (1989). Use of props in questioning preschool witness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1, 187-195.
- Penrod, S. D., Fulero, S. M., & Cutler, B. L. (1995). Expert psychological testimony On eye-witness reli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Daubert: The state of the law and the science. *Behavior Sciences and the Law*, 13(2), 229-160.
- Pollack, D. (2003). *Social work and the courts: a casebook* (2nd ed). NY: Taylor & Francis Books, Inc.
- Sgroi, S. M. (1982). *Handbook of clinical intervention in child sexual abuse*.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 Skinner, L. & Berry, K. B. (1993). Anatomically detailed dolls and evaluation of child sexual abuse allegations: psychometric consideration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7(4), 399-422.
- Stern, P. (1997). *Preparing and presenting expert testimony in child abuse litigation: A Guide for expert witnesses and attorneys*. CA: Sage Publications.
- Summit, R. C. (1983). The child sexual abuse accommodation syndrom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7, 177-193.
- Tomkins, A. (1995).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science evidence in the wake of Daubert. *Behavior Sciences and the Law*, 13(3), 127-130.
- Walker, L E. (1990).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for legal evaluation and expert witness testimony.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1, 344-353.
- Warrant, A. Hulse,-Trotter, K. & Tubas, E. C. (1991). Inducing suggestibility in children, *Law and Human and Behavior*, 15(3), 273-286.